

清华学文专刊

摩登与现代

——中国现代文学的实存分析

解志熙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此书敬献给樊骏先生

“清华学文专刊”出版缘起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清华中文学科复建以来,学科同人瞻前顾后,以继往开来为职志,先后刊行了以清华前辈遗著为主的《清华文丛》和以清华学人新著为主的《新清华文丛》各 8 种。进入新世纪的 5 年来,承蒙学界师友的关爱与支持,清华中文学科在基本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为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对学界的关爱,同人感荷无似,常思有以报之,而报之之道,惟有潜心学术、认真学文,故不揣浅陋,筹划刊行“清华学文专刊”。

“学文”的古典当然是“子曰”的那八个字:“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明清易代之际的顾炎武则对“学”与“行”有更为割切的强调:“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而对清华同人来说,“学文”还是一个更为亲切的“今典”,那就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叶公超曾在清华主编过一份名为《学文》的月刊,它为清华以及北大两校中外文系师生们提供了一个发表创作与学术的阵地。据参加编务的闻一多说,刊物之所以取名《学文》,是因为这样“在态度上较谦虚”。《学文》月刊停刊后,据说也曾是原定编者之一的梁实秋又在《世界日报》上开办了《学文周刊》以继之,其谦虚学文的态度一以贯之:“我们注重的是‘学’字,表示我们是在学习着……我们希望不断的学习,不管年纪到多么大,永远的做‘文学的学生’。”在市场力量日渐冲击着文学和道德的今天,先贤们关于学文以至为人的割

切教诲无疑是值得我们记取的；而作为后来者，我们也非常钦仰先辈们对待文学的那种谦虚朴实而又认真执著的态度。“清华学文专刊”之刊行即兼寓纪念与赓续之意，虽然采取了以书代刊的形式而内容仅限于学术方面。我们自知能力无多、经验不足，但在严肃地学习为文与为人方面则不敢自我宽假，而愿意认认真真地从事、踏踏实实地努力，庶几不辜负先贤的遗教、不辱没先辈的垂范。

“清华学文专刊”着力推动以“释今”为宗旨的“现代研究”，故所收多为有关现代中国文学、思想和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早在1926年朱自清先生就曾发表《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热情呼吁：“我盼望最近的将来多出些现代研究的专家，这是我们最不可少的！而最要紧的，先要打破那‘正统国学’的观念，改变那崇古轻今的风气；空冒无益，要有人先做出几个沉重的例子看看才行！有‘现代的嗜好’的人努力吧！”朱自清先生并躬行实践，成为新文学研究的开山，他的高足王瑶接踵而起，其《中国新文学史稿》更进一步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所以，以与“释古”同样严肃的态度从事“释今”的工作，确是清华前辈们开创的现代学术传统之一。继承这一学术传统而发扬光大之，乃是从事现代研究的清华同人以及“清华学文丛刊”的目标，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得到学界前辈的指导与学界同行的支持。

“清华学文专刊”除刊发清华同人的研究论著之外，也适当吸收海内外学界同行的相关成果，年出一二种，希望假之以年，积少成多，渐成规模，切实推动“释今”的“现代研究”之开展。本专刊编委会成员为王中忱、汪晖、罗钢、孟悦、格非、蓝棣之、解志熙，具体编务工作由执行编委王中忱、解志熙负责。

诤友，坚守与宽容

——解志熙对我的提醒和我对解志熙的提醒

钱理群

志熙希望我为他的这部新的学术论著写几句话，在我是义不容辞的，因为我们有近二十年的交往，彼此都非常熟悉，有过许多的学术交流，关于他的研究，我是有话可说的。

一想到解志熙，我的脑海里就要浮现出这样的情景：他从我家借走满满一车的现代文学作品，他推车前行，身影渐渐消失在暮色苍茫之中，我站立在那里，心中涌出许多的感慨。我这个人，最喜欢年轻人到我这里借书，借得越多，说明他渴望读书，并且在认认真真地读书，这正是我对自己的年轻同行的最大期待。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因为整天忙于写作，以及其他许多该管、不该管的事情，很少有时间读书，包括我自己拥有的书，年轻朋友从我这里借书读，我就觉得我的书终得其主，就说不出的高兴，又不免为自己未能尽读而有几分惆怅。而解志熙向我借书的时候，正是一个许多人又觉得“偌大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人心浮动的历史时刻。因此他在这个时候埋头读书，是很不合时宜的，而且不易被人理解。但我自认是能够理解的：他并非不

关心现实,只是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要坚守自己的独立选择。这样的逆潮流的选择与坚守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当时我做出了和他不同的选择,但内心里对他是欣赏的。这或许可以概括我与志熙的关系:下面我将要谈到,我与他在许多学术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也有不同意见,但我却始终对他的独立坚守持理解与欣赏的态度。而且我认定他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认真读书的人。这在当下的中国,是很不容易的,也确实难得。

志熙给我留下的第二个难忘的印象,是他对我的批评与及时提醒。我在《返观与重构》一书的一篇文章里,对我的《心灵的探寻》一书有这样一段自我反省:“我的一位年轻朋友直言不讳地写道:‘我不喜欢钱先生用以概括鲁迅心理矛盾的‘心灵辩证法’这个概念。显然这个概念极大地帮助了钱先生打开了理解鲁迅心灵矛盾的思路,但同时我要说它也‘先定’地束缚和限制了他的思考。不错,钱先生的确精细地向我们揭示了鲁迅人格和心灵的种种矛盾和困惑,但从他的笔下看来,这些矛盾和困惑最终都得到解决,即由对立达到了辩证的统一。这给人一个错觉,仿佛他之所以层层打开有无数皱折的一把扇子,目的不过是为了让人看到最后那一记漂亮的收合。但鲁迅的思想实际果真如此么?我不无怀疑。事实是,鲁迅思想上的某些矛盾的确是解决了,但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鲁迅内心的某些矛盾和紧张始终存在’。这一批评是击中要害的:它不仅正确地指出了我的这种‘辩证法’恰恰束缚、限制了我对鲁迅的认识和把握,造成了我的鲁迅研究的根本缺陷;它更指明了我的‘世界观’的矛盾。”这里所说的“直言不讳的年轻朋友”就是解志熙。他所指正的我的世界观与研究方法的缺陷,其实是属于深受黑格尔影响的我们那一代人

的, 这表现了在另一种学术背景与传统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学人的学术敏感与批判力, 而志熙能对老师辈学人直言(不仅对我, 也对他的业师支克坚先生, 严家炎先生, 但他对自己的老师又始终保持尊重, 竭尽弟子之劳), 这更是表现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精神, 也显示他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立性, 对任何人, 对任何学术问题, 他都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 独立见解, 并要独立地表达出来, 这是更加难能可贵的。而他的及时提醒, 对我的学术研究的积极作用, 也是明显的。只要看看以后我的鲁迅研究, 以及现代文学研究著作, 就不难看出这一点。因此我对志熙是深怀感激的。这使我坚信, 我与年轻人的接触, 绝不是单向的给予, 而同时也会得到有力的帮助与启迪。一个学者, 是随时需要有人从另一个角度来敲打自己, 提醒自己的, 这才能对自己的研究始终保持一种清醒, 一份谨慎, 一个反省的态度, 这就是“诤友”的作用。坦白地说, 我是把志熙看作是我的年轻的“诤友”之一的。当然, 不是志熙所有的意见, 他对我的所有批评, 我都同意与接受, 这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 因为大家都是独立的学者, 也都会有自己的坚守, 即所谓“固执己见”。但即使不接受, 不同意见的提醒, 也会使自己有所警戒, 在固执己见的同时, 也明白己见的限度, 保持一种清醒, 这也是诤友的作用。

以上说的都是在与志熙交往中他留给我的印象, 并谈及我和他的关系, 这似乎有点离题, 但其实也已经包含了他的学术的两个特点, 一是重视“独立准备资料”(他的大量阅读原版书, 原刊, 就是为此), 一是强调“独立思考问题”。他在《视野·文献·问题·方法——关于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几点感想》(载《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一文中有过明确的表述, 并说明这是以鲁

迅为楷模的,可见这是他的自觉追求。他在另一篇为自己的学弟的新著写的序言里,说到作者的“学术创新无疑来自他的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和独立思考的问题意识”,这也可以看作是他的追求。这都是可以验之于他的学术著作的,本书就是一个明证。志熙希望我写序,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本“现代文学的实存分析”里,大部分课题,如20世纪40年代诗歌、小说研究,师陀小说研究,以及新诗开拓期的诗歌理念的研究,我都有所论及,所以他希望听听我的批评。而正因为我曾经从事过有关领域的研究,所以我读本书时总不免要想起我当年对这些课题的研究与思考,于是,我也就很容易地就发现了本书的许多创新之处。究其原因,正是这两个“独立”。由于“独立准备资料”,他发掘出了在20世纪40年代诗歌研究中长期被淹没的左翼诗潮中的“反抒情”诗派,南北呼应的新的古典主义诗潮,一些被遗忘或被忽视或未能得到充分评价的诗人,如鸥外鸥、汪铭竹、常任侠、沈祖棻、陆志韦、吴兴华等,在新的历史叙述里得到了新的呈现与评价。这就扩大了20世纪40年代诗歌研究的视野,加深了对这一时期诗歌创作与流派的丰富性、创造性的体认。至于他对现代诗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所做的工作(收入本书的《现代诗论辑考小记》,以及《于廛虞诗文集存》,即是这方面的初步成果),更可以说是为现代诗学研究奠定基础的。而“独立思考问题”,就使他对已经有较多积累的研究对象也能说出自己的新的看法,有新的发现,作出富有创造性的新的概括。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师陀小说研究,而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他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对师陀乡土小说创作的影响的讨论,尽管未能充分展开(可能与史料不足有关),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这也是我和志熙一起讨

论过的“现代思想史、学术史视野下的现代文学”,是一个尚待开拓的新的领域,有相当的研究前景。而他将师陀乡土小说概括为“乡土中国‘生活样式’的观照”与“反田园诗叙事”,视为与鲁迅式、茅盾式、沈从文式的乡土小说不同的新的模式,以及他对师陀的《结婚》的“反摩登叙事”的分析,都很有创造性,并且言之成理,显然是对师陀研究以及现代乡土小说、都市小说研究的重要推进。本书还有不少富有启发性的概括,如将艾青命名为“左翼现代主义诗人”,将梁实秋、钱钟书、冯至等的散文概括为“知性散文”等,这些命名与概括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确实是严肃思考与研究的结果,是能够打开研究思路的。

而本书的标题《摩登与现代》所揭示的,构成了全书的一个重要线索的关于“现代”与“摩登”的差别的思考,以及由此提出的“摩登主义”的概念,在我看来,很有可能是志熙对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我完全同意志熙的这一分析:“把文学上的‘现代主义’当作‘摩登’时尚加以模仿、复制并使之趣味化、流行化以及媚俗化的文学行为”,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学与文化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在所难免的‘现代性’表征”。它的要害在于“往往在忘乎所以地追逐国际时尚中迷失了自己”,丧失了文学的主体性。这样的问题,或许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不仅是历史,更是现实问题;不只是文学,也是学术的问题。我们在前面讨论了志熙自觉追求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现在我们又看到,他在对文学的考察与评价上又坚持了文学自主性的标准。这可能是这本书的一个内在的思想线索吧。

本书第二、三辑里的书评、述要,集中了关于学术研究的道路的选择,观念、方法等问题的思考,表明志熙是一个有高度学术自

觉的学者,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我首先注意到,志熙在《〈李霁野文集〉阅读札记》里,重新引述了现代文学研究者耳熟能详,却很少深想的《文学研究会宣言》,指出“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强调这样的观念在新文学的起点上,就确立了“严肃地对待文学和人生的宗旨”,新文学作家在“随后的严峻岁月里”也一直“坚守文学的底线和人生的底线”,从而构成了现代文学三十年贯穿始终的“主导精神”之一,并且“已成为新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这自然是对现代文学精神与传统的一个重要概括,但在我的感觉中,这又是志熙自己和他的朋友们的学术理解、宗旨与追求。

这样的学术理解,有两个要点。一方面,认定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因此有强烈的社会承担意识与生命意识,重视学术研究与“人生”——社会人生与自我人生的密切关系,因而构成了一个终生的,能够为之献身的“事业”。另一方面,又认定这是一项平常的“工作”,是与工人做工、农民种田一样的劳作。志熙自称“现代文学研究的从业人员”,强调要以“平常心”对待学术,都是这个意思。

这也就包含了一种自我定位与自我期许。志熙在文章中引述了鲁迅对未名社的评价,显然以其为楷模:“未名社的同人,实在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地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这“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这其实就是愿为学术研究做铺垫的“泥土”精神。其价值也在这里:当然“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苑的美花”,但却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

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志熙还据此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目标。他说：“依据学术目标的不同，人文历史研究似乎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重在理论创新，即旨在构建某种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学说，而在对具体的历史文化现象本身是非的探究”，“另一种是旨在对具体的历史文化现象做出实事求是的解释。”诚如志熙所说：“一个研究者若能兼具两者之长，那自然再好不过了。但实际上人们的才性往往各有所偏，因而在研究中常常各趋一端，难得兼美。好在从总体上看，这两类研究者各展其长，适成互补，共同推动着学术的进步。”这是一个切实的分析，于是也就有了切实的选择：他显然是以后者作为自己的目标的，他宣布要做的是“常规性的学术研究”。而这样的常规性的学术研究是自有规范的。这就是志熙所说的：“用史实说话，史料说话，力求所说有坚实的文献资料根据。简言之，就是‘博采文献，信而有征’。”（以上并见志熙的《刊海寻书记——〈于赓虞诗文辑存〉编校纪历兼谈现代文学文献的辑佚与整理》，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可以看出，前文所提到的志熙的研究所具的重视“独立准备资料”的特点，正是对这样的学术规范的自觉遵循所带来的。

由此产生的是一种“从文献做起，从问题入手，从头开始”的研究策略。这是志熙在做“现代诗学研究”课题时的设计，但在在我看来，这是可以涵盖他的许多研究的，而且越来越成为他的自觉追求，这就是“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上，努力在这方面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放弃贪大求全的研究——写作计划，坚决收缩讨论的范围，以便集中精力对自己比较有把握的专题进行探讨”。志熙解释说：“在‘写什么’的问题上，我曾经有

过贪大求全的痴心妄想,后来由于研究视野的扩大,感受到问题的复杂性,并深刻意识到自己能力有限,只能脚踏实地、量力而行,所以自觉放弃了先前不切实际的妄想,而将研讨和写作的计划收缩到如上所说的范围。”这段话说得非常实在,却又耐人寻味。我们看到的是,在这样的研究策略的选择的背后,是对研究对象的丰富与复杂的认识的深化和自我局限性的体认,这或许正标示着志熙已经告别了学术研究的青春期,进入学术与人生的“中年”了吧?

“写什么”之外,还有“怎么写”的问题。于是就有了用“叙述和考辨的方式”写作的选择。即将现代文学理论、文学现象“从历史的尘埋中收集起来,对它们当年发生和发展时难免的纷乱略做梳理,并尽可能将它们发生、演变的前因后果,及其相互之间本来就有却因为历史的原因不太明了的关系,揭示出来,叙述出来,让人看过之后,觉得‘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吧’,而不是‘你不说我还比较清楚,你越说我倒越糊涂了’,也就够了”。(以上并见《视野·文献·问题·方法——关于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几点感想》)这有点“返朴归真”的味道,是与学术研究要“回到常识”的总体追求相一致的。

这样,志熙在经过长期的摸索,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后,终于在学术理念、定位、目标、规范,以及研究策略、方法、写法诸多方面,都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选择,相对稳定的追求,这就意味着他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找到了自己”,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个性与风格。当然,这不会也不应该成为自我凝定与束缚,我也相信志熙还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学术思路,有新的尝试与突破。但无论如何,“这一个”的形成,毕竟是学术

成熟的标志，作为老朋友，我由衷地为志熙感到高兴。而且我要说，志熙所选择的“常规性学术研究”的道路，他把学术视为“严肃的工作”这种理解，态度，学风，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现代文学研究界，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又到了一个“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的时代，一个浮躁与虚华的时代，一个不认真读书的时代。

我觉得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志熙在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以后，对不同的选择，也能抱有理解的同情与尊重。首先是对现代文学史上的另一种选择，即“以趣味为中心”的“现代趣味主义文学”，就充分肯定了其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存在权利和不可忽视的价值”，同时又指出了其本身存在的悖论与困境。而对学术上的另一种“重在理论创新，旨在构建某种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学说”的追求与道路，也充分肯定了其“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以至于社会的进步”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并且充满理解地指出：“对这样的研究者及其理论学说我们自然只能重其大而略其小，不必要求他们一切都合乎学术常规，不能苛求他们的理论创新同时具有‘细节的真实’。”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讲学术规范，其实是有两个层面的，一个是底线，是对全体学者的，如志熙所起草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共识述要》里所强调的“学术创新必须建立在充分和可靠的文献史料基础上”，必须“尊重他人在文献发掘上的劳绩”，必须“遵守文献援引的规范”等等；但另一种规范与要求，是对某种特定的学术目标与选择的，更准确地说，每一种学术目标与学术道路，都自有其规范与要求，这是不必也不能统一的。从这样的观点看，志熙起草的前述《共识述要》将“是否注重原始文献的发掘”作为“衡量学风和学术道德”的一个“重要

指标”就有些不妥,是把自己的学术追求、特定学术目标下的规范当做普遍的规范来要求所有的学者,就有可能压抑了与己不同的另一种选择。

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虽然志熙在理论上、理智上十分清楚对不同于己的选择要持理解与尊重的态度,但在感情上却难以摆脱对另一种选择的“不以为然”以至反感,比较容易看到以至夸大其缺陷与不足,特别是一到具体的问题,就很自然地、自觉不自觉地以自己深以为然的学术理念、方法、规范作为一个绝对的普遍标准来衡量、要求他人的学术。自我学术意识越强,学术个性越鲜明的学者,越容易发生这样的偏颇,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偏见”。我自己就经常陷于这样的理智与感情的矛盾,并为不能摆脱某种偏见而苦恼。我读志熙的有些文章,就感到他在阐发或捍卫自己的学术追求时,是非常有力的,但对另一种选择的批评(这是不可避免,也是必要的)就多少有些偏激。但我从来不对志熙提出,因为在我看来,这种偏激是与学术个性的鲜明联系在一起,我担心对偶有的偏激的过分批评会削弱甚至抹杀有个性的学者应有的锋芒。而且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偏激是年轻人的特权,随着他们自身的成长与成熟,是会自己来解决的。

但现在,我却要提醒志熙了。这不仅是因为如上文所说,他已人到中年,过了人生与学术的青春期,可以更冷静地来反省某些问题了,更是因为志熙和他这一代的中年学者,已经成为学术界、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中坚力量,特别是志熙个人的学术影响越来越大,他的学术追求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甚至有可能成为学术的主流,随着学术地位的提高,就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学术权力:

这都是必然发生的历史过程,对志熙个人,他们这一代人,以及现代文学研究界,这都是好事。但也可能(不是必然)孕含着新的问题,以至危机:本来是纯属个人的偏激,如果和影响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就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压抑了某种新的学术可能性。

因此,由于自身的地位、处境变了,就需要做一定的调整。周作人有一个观点给我印象很深,并一直以此来警戒自己。他说:“当自己求自由发展时对于迫压的势力,不应取忍受的态度;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不可不采取宽容的态度。”周作人还说:“聪明的批评家自己不妨属于已成势力的一分子,但同时应有对于新兴潮流的理解与承认。”(《自己的园地·文学上的宽容》)周作人据此而对新文学的文学语言的发展,提出了这样的反省:“五四前后,古文好坐着正统宝座的时候,我们的恶骂力攻都是对的,到了已经逊位列入齐民(按:指1920年教育部规定中小学一律废除文言文教材,改用白话文),如还是不承认他(文言文)是华语文学的一部分”,“这就未免有点错误了”(《艺术与生活·国语文学谈》)。这是很有启发性的。在我看来,志熙和许多年轻朋友当年固执地坚守自己的学术选择,努力发出自己的多少有些偏激的声音,都是对的,必要的;而在自己成为已成势力以后,也依然需要,或者说更加需要坚守与创新,不能因为得到承认获得成功而失去思想与学术的锐气和锋芒。但同时也要在“坚守”与“宽容”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即自己的学术要坚守,对别人的不同于自己的学术选择,特别是对年轻人的学术探讨,要持更宽容的态度。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对研究生的培养问题。我曾经谈到过

一个“如何对待‘特别’的学生的的问题”。我说：“这样的学生，常常有一些以寻常的眼光看来是比较‘怪’的想法，他们的思维是反常规的，经常让导师都大吃一惊。很显然，这样的学生，连同他们的古怪想法，是很容易被否认和抹杀的。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们的‘怪念头’有的恰恰是极富创造性的，甚至是超前的；但同时又是和一些混乱不清的、甚至是谬误的东西混杂在一起，一时难以区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导师，就有责任要保护这样的学生的极其可贵的创造性，那些属于未来的创造的萌芽，同时也要指出其问题，加以引导——引导也是保护。这样做的前提，就是导师要有自我质疑的精神，不能简单地认为，自己不懂的，不能理解与接受，与自己不同的，就是错的，不好的。”（《学魂重铸：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以上所说，其实都是泛泛而论，并不是具体针对解志熙的，因为我对他带了多少研究生，怎么带研究生都一无所知。因此，同样是提醒，志熙当年对我的提醒是有的放矢的；而现在我对他的提醒，则是预防性的。

坦白地说，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借为志熙的新著写序的机会，表达我对学界与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种期待，一个祝愿：愿学者之间多有些诤友，愿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多一点严肃的坚守和明达的宽容。

2006年4月1日—5日

目 录

诤友,坚守与宽容——解志熙对我的提醒和我对解志熙的提醒
_____ 钱理群 3

暴风雨中的行吟:抗战及40年代新诗潮叙论_____ 1

新诗坛在抗战爆发前后的转变……战鼓与警钟:从抗战诗到讽刺诗及其他……左翼诗潮的新面目:“七月”诗派与“反抒情”诗派……现代与传统的接续:南北呼应的新古典主义诗潮……现实、象征与玄学的综合:现代主义诗潮的“新生代”……大一统前的小分裂:40年代末的新诗方向之争

精深的冯至与博大的艾青:中国现代诗两大家叙论_____ 96

冯至:为诗的创造和研究“忍耐而工作”的一生……青春的抒情:20年代“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存在的体验:40年代“沉思的诗人冯至”……“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诗人艾青的由来与复归……十年心血树丰碑:诗的“现代中国”总体形象的塑造……独立的自我和开放的艺术:作为“左翼现代主义者”的诗人艾青

走向“分析”及其他:抗战及40年代小说叙论_____ 143

开始与转折的开始:从抗战小说到讽刺暴露小说……沙汀与路翎:左